

胡適的徘徊與曖昧

——兼評黃克武《胡適的頓挫》

● 伍 國

作為一名深刻影響現代中國的啟蒙思想家、遵循杜威 (John Dewey) 實用主義思想方法以再造文明的學者、民國政府與蔣介石的批評者和合作者，胡適的生平、成就、立場多年來一直被台灣、美國、中國大陸的學者反覆審視和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著名學者黃克武的新著《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以下簡稱「黃著」，引用只註頁碼)^①，對胡適思想的來源、政治選擇，以及其在台灣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全新的深入

以看作圍繞胡適的思想起源以及其不同時間和處境中與政治周旋的單獨專論。在導論部分，黃克武闡述了自己的主要關懷是胡適終其一生不曾改變的「既想堅持獨立自主精神，而與政治保持距離，又不得不涉入政壇的」、「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態度(〈序〉，頁6)。針對學界已有的以雷震、殷海光和胡適做類比，認為胡適相較之下膽小、懦弱，或者立場過於政治化的批評，黃克武提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他認為，其一，認為胡適「膽小」的人，如書中提及的唐德剛、楊奎松，在相同的情境下未必能比胡適做得更好；其二，雷震和殷海光的決絕抗爭未必就比胡適的妥協更有對未來的洞察力(〈序〉，頁8-14)。

黃克武對胡適的辯護首先在於站穩立場，將胡適定位為雖然在現實中不得不「打折扣」，但本質上仍然是一位畢生支持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者」(〈序〉，頁15)；在這一前提下進一步定義胡適為「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序〉，頁17)。在這裏，保守意味着和平漸進改良，允許批判和反對意見，並通過

研究，彰顯胡適被自身的自由主義理想和現實中的威權主義政治前後夾擊，試圖適應、引導、批評，也不得不妥協的心路歷程。筆者認為，由於胡適本身的複雜和多面，在資料已然繁多的當下，任何對胡適的再評價都將是困難的，事實上也最終取決於作者自身的價值判斷。

全書由七章組成，第一章「導論：胡適檔案與胡適研究」以後的六章可



《胡適的頓挫》對胡適思想的來源、政治選擇，以及其在台灣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全新的深入研究。(資料圖片)

立法實現社會改革，而這一路徑確實和杜威的實驗主義精神有內在關聯。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黃克武認為胡適和蔣介石的關係屬於「道不同而相為謀」（〈序〉，頁19）、充滿摩擦和張力的合作與相互利用關係，而不能把雙方關係完全看成志同道合的合作無間。

在某種意義上，目前胡適所留下的手稿、檔案、藏書和有關胡適的資料，在北京、台北、美國紐約三地已經可謂汗牛充棟，數量和開放程度早已不是問題，但如同黃克武所言，在面對材料時，研究者必須繞過胡適為了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刻意加入的修飾、曲筆隱語，走進胡適的內心；更應該超越政治因素，方能還原一個真實、有血有肉的胡適（頁40-42）。黃克武認為胡適應該得到更多的同情，這一立場本身屬於價值判斷範疇，而筆者認為胡適不值得過多同情，同樣屬於價值判斷範疇，因此，本文與其說是從技術層面評書，不如說是對胡適其人的一次再評判。

一 胡適的思想局限與對殷海光的再評估

黃著在思想史，特別是梳理胡適思想源流方面有兩個貢獻。一是明確了胡適對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的了解和接受來自殷海光的翻譯。胡適在1951年旅居美國時通過友人周德偉從而了解到哈耶克以及殷海光的思想動態，並由此在1953年末於紐約購買哈耶克的代表作——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為給自己的生日禮物。黃克武贊同一些既有的研究結論，即接觸哈耶克思想促

成了胡適思想從「肯定社會主義到轉向資本主義」的重要「思想轉向」（頁53-54）。這一轉型的完成標誌，即胡適在1954年發表的〈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演說（頁56）。

黃克武似乎還可以更進一步開掘胡適這次轉型的思想史意義，而不是像在書中那樣，僅僅把這一案例降級為如何以檔案解決疑難的檔案使用問題。在筆者看來，胡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不論是原則上秉持的言論自由、憲政民主，還是方法論上始終不放棄的漸進和實驗主義，都一直缺少哈耶克式的經濟解釋。這是因為，縱觀胡適的思想歷程和傳世的著述，乃至私人書信中討論的內容，可以斷定其治學基本上是史學的進路和部分考據癖的執著，很少真正從經濟學和經濟理論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的制度基礎。

僅就「對哈耶克的接受」這個論題而言，出生於1891年的胡適，與殷海光的學生、出生於1934年的林毓生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據林毓生回憶，殷海光是在1953至1954年陸續發表《到奴役之路》的中譯，而他受此影響，在獲得一筆翻譯稿費後，即在台北郵購《到奴役之路》的英文原版，並在1956年10月左右收到，然後開始與殷海光有所節略的譯本對勘閱讀^②。也就是說，林毓生對哈耶克英文原著的精讀只比胡適晚了三年，此時的林毓生是一位年僅二十二歲、渴求知識和真理的青年。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毓生在閱讀哈耶克著作的同時，也讀波普爾（Karl R.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從而很早就得以直接「進入西方純正自由主義的，具有歷史深度的，理論主題的引導」^③，乃至後來真正成為哈耶克的入室弟子。

儘管談不上批評，我們也可以客觀地指出，胡適對哈耶克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二十世紀中後期產生深遠影響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了解，即使可以被看成是其一生思想的重要轉折，但或許來得太晚，而且缺少對其他同期思想家如波普爾的深入閱讀，加上胡適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徘徊往復，筆者不認為胡適對與自己同時代的反烏托邦的自由主義思想的領悟，能夠超過殷海光和林毓生師徒。閱讀殷海光的著作可以發現，殷海光遠比熱衷於考證文學史和史學問題、偶爾還寫幾首寡淡無味的現代詩的胡適，更像一位思維嚴密、對現代社會科學諸門類極為了然的社會科學家。我們通過胡適反而可以更多地反觀和認識殷海光，但這並不是因為殷海光遭受迫害而有更多的道德光環，也不必在意胡適是否「膽小」，而恰恰是因為殷海光的思想本身已經超越了胡適。

首先，這一超越不僅體現在前述殷海光把胡適引入了哈耶克的世界，以及殷海光推重哈耶克和波普爾；也體現在殷海光更具有現代社會科學家的素養。一個例子是，1960年林毓生為殷海光在美國購買社會理論家默頓(Robert K. Merton)的《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書，以及其對行為科學的看重^④。筆者認為，現代社會科學的行為主義路向，可以說是胡適未能關注的領域。後來殷海光、林毓生師徒二人又討論過人類學的結構功能主義，而他們也已經明確地在書信往還中反思「早期五四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⑤。另一個例子是，當胡適1948年匆匆離開北平時，隨身攜帶的三部書全是中國文學典籍：《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陶淵明集》以

及《杜詩箋注》，可見胡適的文人趣味之強。胡適的氣質其實也更接近史學家。由於胡適的史學考據傾向，他也得到一代史學宗師陳垣(字援庵)的讚賞。據陳垣的學生史念海回憶：「先生因曾稱道胡適之博及群籍，於《水經注》的版本蒐羅殆盡……」而在他的年代，「以史學名家的大師，無不用力於考證」^⑥。在這一已經完成代際轉換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興趣面前，胡適更顯得像熱衷從政、夢想「得君行道」的舊式文人，或者基本上呈現了民國初年「由傳統蛻變為轉型知識份子」的「轉型期知識份子」的諸多特徵^⑦。

其次，這一超越還體現在殷海光和林毓生師徒在通信中對美國社會生活「淺薄」、「乏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以及對海外華人學者「寄人籬下，幫美國人搞中國東西，混一口飯吃」的無奈^⑧。他們對美中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有更多的敏感，而筆者始終認為，胡適作為中國思想家，對美國缺少了應有的批判。在論及胡適時，殷海光甚至認為美國漢學家萊特(Arthur Wright)的一項對中國文明的研究，「其中所表現的識度之深宏決非胡適可比」^⑨。換句話說，就文化研究而論，胡適在殷海光眼裏見識還未達到美國一流漢學家的水平。

筆者認為，指出胡適經歷了一個從「肯定社會主義到轉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似乎還是不夠的，因為這裏沒有清晰地指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於胡適而言究竟是不是兩種所有制形式，以及「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對立，但哈耶克本人還做過另一項重要的理論分疏：「所有的社會活動都必須成為一個設計嚴密的且得到人們公認的計劃的一部分。它們都是唯理主義的『個人主義』的產物，

因為這種偽個人主義想讓所有事物都變成有意識的個人理性的產物。」在哈耶克看來，歐陸的「唯理主義的偽個人主義」和英美自由傳統——「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前者雖然也叫「自由主義」，但本質上贊同「中央集權制、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⑩。胡適的認識轉換是否也深入到這一層分疏，還是僅停留在計劃經濟妨害個人自由一層，在黃著中由於被納入導論一章，因而沒有得到充分闡釋。

胡適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糾葛和曖昧，同一時期的吳宓卻是看得十分明白：「然我輩之所以惡於詹姆士、杜威、胡適者，正以其學說主張有近似於馬列主義唯物論社會主義耳。」^⑪這則吳宓日記寫於1955年，吳宓想必不會知道胡適思想已經發生向哈耶克突進的一大轉折，但其對胡適思想接近社會主義的批評基於前三十年間對杜威和胡適的長期觀察，是難以辯駁的。

在第二章中，黃著集中揭示胡適思想中赫胥黎 (Aldous L. Huxley) 的重要影響。胡適經由嚴復的翻譯接觸到赫胥黎的思想，並受到嚴復本人對《天演論》全書基調由悲觀到樂觀的矯正，相信人的自由與努力可以突破自然的限制。但是，胡適本人最大的收穫則是在赫胥黎的生物進化思想中得到質疑和抵抗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武器。在胡適看來，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辯證法是進化論出現之前的「玄學」，而實驗主義是進化論出現之後的「科學方法」，以進化論—實驗主義的眼光來看，無論是自然的演變還是人為的選擇，都是由於、也必須經歷一點一滴的變異，而不可能一步跳到、更不可能在跳到以後一成不變。

胡適重視「證據」的思維方式也同樣淵源於赫胥黎。胡適基於現代實證科學的證據思想，又和清代考據學結合起來，基本上形塑了其一生的治學特色，但是黃克武也指出，「第一位認為清代考證學具有類似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人應該是梁啟超」(頁81)；同時，胡適模糊了清代樸學和現代科學在目標方面的「根本的區別」(頁85)。更有趣的是，此章中敘述胡適與其學生牟宗三的交鋒，完全彰顯了二人在治學路徑和氣質上的差異。牟宗三對易學的形而上釋讀使老師胡適無從置喙，蓋因為以胡適的實證主義和存疑主義傾向，對於「形而上」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實際上，讀者從黃著中記述的胡牟之爭也可看出，胡適對「形而上」的排拒和對黑格爾辯證法為「玄學」的指斥，以及後來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否定和逃避都是一致和連貫的。當然，就否定黑格爾的「玄學」史觀而言，胡適的確和波普爾不謀而合，因為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就把這種追求揭示歷史的普遍規律和意義的史觀斥為本質上反理性的「神諭哲學」(oracular philosophy)^⑫。

然而，胡適的思維畢竟不是任何人的簡單翻版。黃著注意到，胡適思想中存在一些矛盾和混雜之處，他把赫胥黎提出的“Agnosticism”(通譯「不可知論」)譯為「存疑論」，但又自稱「我是個存疑論者，無神論者」。在筆者看來，胡適不僅如黃克武所說，「模糊了存疑論與無神論的界線」(頁104)，更是犯了邏輯錯誤，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既是不可知論者，又是無神論者。一個顯明的例子是，如果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和「祭神如神在」表明他是不可知論者或存疑論者，那

麼他就不可能同時是一個毫無疑問的無神論者。此外，黃克武更為犀利地指出，胡適也並未恪守絕對實證主義，而是滑入道德領域，這樣做的認識論前提，則是胡適相比起赫胥黎，自己擴大了「知識」的範圍。同時，由於深受儒家、佛家思想影響，胡適不可能接受徹底和極端的個人主義，仍然強調群己和諧，體現為他申說的「社會不朽」宇宙觀和歷史觀（頁104）。

在1923年轟動一時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胡適自稱是一個無神論者，而且認為因為「人生總隨環境變化，所以必須以科學的態度研究人生。科學的人生哲學必須為一種作為行動指南的人生觀和規則提供基礎」，以及「堅持採用科學的精神、態度、和方法對待倫理」^③。在這裏，胡適已經混淆了科學和人生/倫理的論域界限，所謂「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還是「科學精神」意義上的科學，可以「指導人生」的理念，在今天看來顯然是對科學的某種濫用。

在承認了胡適思想來源的雜多以及其本人的闡釋偏差後，黃克武最終反而接受了唐德剛對胡適學術思想膚淺和支離、缺乏對「赫胥黎以後的社會科學」的把握的批評，也認為「這樣的治學方法與態度或許限制了胡適，使他在學術與政治上無法取得更耀眼的成就」（頁109）。筆者則想再度指出：唐德剛對胡適的批評，以及黃著對胡適自身局限的承認，恰恰可以對應筆者對殷海光和林毓生的肯定，即在中國自由主義的脈絡中，是殷海光和林毓生這兩代學人補足了第一代啟蒙者胡適的短板，真正走進了「赫胥黎以後的」西方主流社會科學，也去除了胡適身上的考據家和帝王師雙重氣質。

二 胡適與梁啟超及 黨派政治

梁啟超和胡適共同作為反對激烈社會變動的「非革命的民主派」（頁121），在1918至1922年間曾經有過一段交集。黃著第三章指出，1920年代，北方知識界存在以胡適為首的北京大學知識份子和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兩大陣營，但兩大陣營的結盟努力最終流產。筆者以為，今人可能有必要明確認識到，梁啟超的首要身份是政治活動家，其次才是學者；而胡適則反過來，首先是一個受過完整現代教育、特別是美式博士訓練的學者和教授，其次才是難以忘情政治的國是參與者。因此，梁啟超和胡適的政治合作是從1918年開始，由研究系領袖梁啟超直接或間接地接觸胡適，而梁啟超之所以知道胡適，乃是由於讀到報章上胡適的哲學史著作。儘管年齡有較大差異，但兩人在反對激進革命、主張漸進改革、反對唯物史觀和階級革命方面所見略同。

由於梁啟超首先是政治活動家，其活動並不拒絕軍閥勢力的金援，而胡適作為愛惜羽毛的清流教授，對於研究系的軍閥派系色彩以及與派系之間的經濟糾葛使他產生疑慮，但他仍然表現出自己慣常的複雜和曖昧。一方面，胡適開始靠攏梁啟超，也因這一層關係備受質疑，還促成了《新青年》編輯部在1919至1920年間的逐漸分裂；另一方面，胡適卻「向陳獨秀說明自己並未與研究系勾結……隱藏了雙方『暗通款曲』的一面」（頁147）。在胡適1921年初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把《新青年》同仁劃為「我們」，把梁啟超等劃為「他們」^④。事實上，正如黃克武列出的多處例證所示，胡適和梁啟超在不同場合惺惺相惜甚至

相互吹捧，但梁啟超在當時由於其「滑頭」而受青年學生厭棄，又由於其保皇歷史而受原屬晚清革命派的陳獨秀抵制。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事實上已經初嚐後來屢次經歷的困境，即既要和一個爭議人物保持接觸，又要向批評者自辯，同時要在公眾面前維持「清流」的形象。即便如此，上述關於胡適向陳獨秀隱藏其與梁啟超交往的敘述，也足以讓讀者對胡適的行為產生一絲懷疑——胡適為甚麼要隱瞞事實？

正如筆者在下文還將試圖揭示的，胡適在他人眼中的軟弱，其根源可能在於胡適內心是一個「貪婪」的人，希望把一切都握在手中：既要建立新的關係，又不想放棄原來的關係；既要參與政治，又不願組黨從而破壞其獨立和超然的形象，這一圓滑和曖昧的個性與梁啟超毫不遮掩的政治和派別屬性、陳獨秀的倔強固執都不一樣。假如以個性看人，則胡適一直是個甚麼都想得到的人，而其晚年「困境」也大半源於此，並不是礙於情境壓迫，因此也不必認為別人在相同情境下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雖然「胡適十分注意保持自己的獨立性」^⑮，但其非黨派議政、做公正的「評判員」的夢想注定是難以實現的。首先，胡適期待的「好人政府」口號在當時已被人視為「幼稚」，因為「好人而無法治豈足為政」（頁165）。筆者則認為，「好人政府」理念在其深處還是體現了儒家道德主義的君子理想，這裏再次證明轉型期知識份子胡適強烈的儒家特質。其次，美國的胡適研究者格萊德（Jerome B. Grieder）指出，自由主義政治的前提就是承認和接受現代社會的利益衝突和對立，進而確認黨派存在的合法性，而超然的、非黨派的政治主張

否定了現代社會利益衝突的合法性及其政治表達，這本身就是「反自由」的，甚至潛在地含有「威權主義」的因子^⑯。胡適的自由主義似乎僅限於基本原理和漸進的路徑，而沒有回答在一個具體情境下如何建構自由主義政黨政治的問題，這應該是胡適自由主義的一個缺陷。

黃克武則着重從社會理論視角提出了一種闡釋，即不論是胡適還是研究系，都屬於上層都市知識份子階層，雖然這個階層可以熟練操作當時的「公共輿論」，無奈他們生活在一個「『市民社會』基礎十分薄弱的時代」（頁168）。現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一向是十分薄弱的，因此，胡適和其他北大知識份子的言論與政治興趣，在既無社會基礎又拒絕政黨依託的情況下，也只能成為書生論政。其實，胡適所處的時代已經是一個「群眾力量崛起，平民走向政治舞台」，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時代^⑰，這使得胡適拒絕左翼激進主義、特別看重個人獨立的精英個人主義立場顯得更加孤立。

三 再觀胡適與蔣介石之關係

以非黨派的個人主義立場和自由主義基本價值面對強勢崛起的蔣介石政權，以及實行軍政和訓政的國民黨，對於胡適來說必然是另一個巨大挑戰。1929年，胡適因為倡導人權而發表涉及孫中山訓政思想的言論，即被國民黨當局警告^⑱。1930年代，胡適關於民主制度是幼稚園政治因而更為易行的言論，與多數維護國民黨威權的知識份子如錢端升、蔣廷黻等人形成觀點對立，胡適甚至表示贊成

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①9}。這些傾向都背離了國民黨的文化和政治保守主義。抗日戰爭中的1942年，在美國游說的胡適被國民政府婉言謝絕歸國，余英時一眼看出「美國既已參戰，胡適對國民黨的利用價值已失，當然可以棄如敝屣了」^{②0}。也有論者看出，在西安事變前後，胡適對蔣介石既採取一種熱心「進言」、強調蔣介石對中國的「重要」的態度，又從「純正」的「國家立場」主張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可見胡適在「蔣介石」和「國家」之間有某種微妙的矛盾心理^{②1}。

儘管有一系列不愉快事件，但如黃著第四章所揭示，在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胡適滯留美國並最終回台的幾年中，胡適和蔣介石之間仍然保持緊密的依賴和利用關係。黃著在充分運用史料的基礎上指出，胡適不但不是蔣介石的嚴厲批判者，還與之積極合作，為蔣介石的「反共抗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啟迪。胡適在1949年6月接到蔣介石的來信，敦促在美國的胡適擔任阻止美國承認中共政權的說客；1950年3月31日，蔣介石續聘胡適為「總統府資政」，在1951至1955年間前後九次總共向胡適饋贈45,000美元（頁182-83）。

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1949年8月發布的《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中，艾奇遜(Dean G. Acheson)在承認中國革命的蘇聯影響的同時，強調革命是「中國內部力量導致的結果」，國民黨與其說是被「打敗」，不如說是自己「解體」^{②2}。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胡適於1950年9月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物上發表〈斯大林大戰略中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一文，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論證為斯大林戰略的一部分和蘇俄扶持的結果

(頁188)。以胡適的精英視角來看近代中國，除了蘇俄因素，大概也絕不會承認中國革命客觀存在的底層動能。政治上，胡適的論說顯然為國民黨找到一個絕好的台階。筆者認為，胡適從生僻的《水經注》研究忽而轉向現實的政治分析^{②3}，又從國民黨立場把中共的勝利解釋為最符合國民黨胃口、也最能迎合當時美國冷戰心態的「蘇俄扶持」論，並且以總統府資政身份，在事實上並非純學術刊物的《外交事務》上發表政論，這一舉動完全無法以情勢所迫、既要保持獨立又不得不涉足政壇的含混之詞敷衍過去。事實上，胡適是以公職身份，憑藉其在國際學界的聲望，在領到津貼（至少不會拒絕）的情況下為蔣介石做說客，從理論上為蔣介石政權的失敗辯白，並巧妙地將流落台灣的蔣政權納入美國抗蘇的大戰略。

黃著進一步顯示，胡適在《外交事務》發表政論文章後仍意猶未盡，曾致信蔣介石，敦請其閱讀此文的中譯，並建議蔣介石仔細研讀中共重要文獻，同時也倡議推進台灣民主化；蔣介石則在讀後肯定胡適的文章是「近年來揭發蘇俄對華陰謀第一篇之文章」（頁192）。在今天看來，這一良好互動只能說明胡適盡職盡責地擔任了總統府資政的角色，「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做了一個優秀的御用說客，也說明「企圖贏得美國人的好感」的蔣介石深知胡適的利用價值（頁195）。但是，要筆者承認這樣的胡適是一個「獨立」的「自由主義者」，則實在不知道「獨立」該如何定義，「自由主義」該做何種解讀，「困境」又從何談起。筆者不得不贊同桑兵對胡適的論斷：「將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於外援或外力干涉之上，甚至不惜將自己與獨裁政權綁在一起，這是中

國自由主義者的無奈與悲哀」，以及其轉引的顧頡剛對胡適的批評：「幫腔有損清譽，殉葬太不值得。」²⁴

以這種多重身份的不停轉換來看，做過總統府資政後被任命為中研院院長的胡適，面對因《自由中國》雜誌評論時政而被捕的社長雷震、因傳播新思想而遭受打壓的自由派《文星》雜誌時，其妥協和曖昧態度就完全不奇怪了。黃著第五章指出，胡適對《文星》雜誌同仁和崇拜他的自由主義者群體「十分冷淡，吝於回應」（頁218）。假如早期的胡適如此看重個體獨立性，如此反對黨派政治，那麼面對真正獨立、敢於批評執政黨的自由主義份子自當引為同道，但是此時的胡適已經以高級幕僚身份自我定位，處處以「國家」為念，明言要給予蔣介石「道義的支持」（頁209），始終「不想和蔣翻臉」（頁211），對年輕的激進自由份子，自然也就興趣缺缺了。

在這裏，筆者想引用意識形態色彩相對較淡的同時代人曹聚仁對魯迅和胡適的對比觀察。曹聚仁認為，魯迅對中年人，即自己的同代人不肯認輸，但對青年人「肯讓步肯認輸」，而陳獨秀和胡適「高高在上，和青年脫了節」。至於胡適和魯迅的為人，曹聚仁認為，「我覺得胡適的和氣謙恭態，是一種手腕，反而使人不敢親近；魯迅倒是可以談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²⁵。筆者以為，胡適對待《文星》雜誌的態度，從曹聚仁上述的話裏也能看出端倪。然而，即使到了此時，胡適仍然有五四時期反傳統的一面，即堅決不承認中國傳統中「具有發展科學所需要的精神價值」（頁229）。

由於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所藏

《蔣介石日記》的開放，今日的研究者已經可以以此窺見蔣介石如何品評人物。經由黃克武在第七章中的梳理可以看出，日記裏蔣介石對胡適罵不絕口。如果說辱罵只是暴露自身的素養不足，那麼在日記裏「蔣仍維持他對胡適的不屑之感」就更加值得玩味了（頁337），因為在人際交往中，「不屑」不會源於衝動，而是長期印象積累所致。在蔣介石的筆下，胡適是「政客愛好面子而不重品性」的代表，是「勾結美國」的「反動政客」，是他「最不願見的無賴政客」（頁337、327、334）。蔣介石1958年5月10日的日記更是對胡適未蓋棺已論定，把他等同於職業政客如左舜生：「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廉潔不苟之態度，甚歎士風墜落人心卑污。」（頁319）

筆者以為，黃著第七章大量引述《蔣介石日記》中涉及胡適的上述評價，提供了一個極其有趣的審視胡適的視角。第一，以蔣介石一生遇人之多，識人之繁，其判斷不可能完全無所本，他自始至終對胡適以「政客」稱之，甚至加以「無賴」的稱號，完全不提胡適作為學者的「尊貴」身份，不得不讓讀者思考胡適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的確給胡適標榜的「獨立性」一記重擊。第二，蔣介石看穿了「甚麼都想要」的一類政學兩者通吃的學人的特性，而胡適從蔣介石處獲得官職和美元的事實，再結合蔣介石的私人評價，難免令讀者感到，就知人論世而言，蔣介石的貶斥不無道理，而胡適自認出於「道義」的襄助，在蔣介石眼裏純屬自利行為。在黃著中，雖然胡適的人品似乎並沒有被深究，但黃克武也感到，胡適在試圖阻止蔣介石連任但又最終放棄的過程中存在性格的缺陷：「胡適既想抗議威

權統治，又常顧慮現實而臨陣退縮的性格在此表露無遺。」(頁344)

余英時甚至更早就發現胡適的顧慮、退縮，處心積慮維持完美人設。胡適在處理和兩名美國女士的曖昧關係時，充分體現若即若離，不主動、不拒絕、不深入，甚至同時在兩名情人間周旋的性格，但在日記中又製造「障眼法」，刻意誤導後世讀者把思念情人的表達當作回憶少年往事^②。筆者以今人的眼光看，已婚的胡適在國難期間忙裏偷閒，纏綿於兩名美國女性之間，實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以名人日記寫作而言，既然胡適都知道在自己的日記裏製造障眼法，蔣介石又何嘗不知道自己的日記終將成為天下共覽之公器？其痛扁胡適，何嘗不是為了昭示後人？

四 結語

黃著對胡適的一些生平史實進行了細緻的挖掘，鉤沉提要，釐清了真實的胡適的諸多面向。胡適研究本已是個老話題，此書可說是「舊學商量加邃密」，惟於宏觀結論有所不足。作者已經在導論中提前採取了為胡適作適當辯護的立場，而在後來的單篇論述中存在敘事有餘、分析不足、結論乏力的缺陷，事實上全書只有引論，而沒有專門的結論一章，甚至反而呈現了某種矛盾——作者提出的諸多事例無法有效地支撐對胡適的辯護，反而使得胡適的形象更加受損。筆者更多地看到胡適的曖昧、圓滑、過於熱衷政治的一面，反而更加認同殷海光等人雖然在威權制度下過得極不順遂，但絕不想去做「諍臣」的真正的獨立知識份子的選擇。

以對自由主義的把握而言，胡適在經由殷海光間接觸哈耶克之前，其實一直停留在民國初年中國精英啟蒙知識份子追求言論、出版、結社、信仰自由的階段，也從未能擺脫對自由的期許嚴重仰賴於「自由主義份子自身無法控制的社會、經濟、政治力量」這一根本困境^③。晚近學者的研究仍然把胡適的思想看作現代裝扮下的儒家理念：「如同中國歷史上眾多思想家一樣，胡適思想的立足點並不在系統思考，而在人格解決。」^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除了堅持漸進和實證路徑，胡適的思想立場實際上在儒家、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存疑論、無神論之間游移不定。

更諷刺的是，即便胡適盡力和激進者保持距離，《蔣介石日記》中對胡適的評價卻令人齒冷。讀者即使不全盤接受蔣介石對胡適的攻擊，也可以看到在這種不對等的關係中，去做「道義」上的「諍臣」無異於自取其辱。胡適獲得了金錢、地位，以至某種獨立批評者的外部形象，但在施予他金錢和地位的恩主眼裏，一切無所遁形，他頂着「無恥政客」的帽子卻不自知。這是放棄了真正的獨立性，選擇與權力媾和的學人留下的教訓。由於人的行為終究取決於自由意志選擇，筆者認為，世俗地位和經濟利益不如胡適、但敢於抗爭並且付出代價的學人如殷海光，在品格和認知上都更令人敬重。黃著強調胡適的「艱辛處境」(頁390)，似並不容易說服讀者。

筆者仍然認為，胡適的世俗貪婪——既要政治地位，又要金錢回報，還要享受學界清譽——是其一切行為的真正動因，是屬於個人自由意志可以選擇的範圍，絕非外部形勢所迫。胡適既然做了這樣的選擇，就

不能逃掉時人和後人的審視甚至苛評。筆者相信，在二十世紀中國，一個完全正直的知識人不可能同時擁有地位、金錢和「獨立」的清譽，如果全部順利擁有，則其人的確可謂一個政客型學者。

註釋

① 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21）。

②③ 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代序二）〉，載王元化主編：《殷海光 林毓生書信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2-14；16，註釋1。

④⑤⑥⑨ 《殷海光 林毓生書信錄》，頁4、44；8；49；52。

⑥ 史念海：〈憶先師陳援庵先生〉，載陳智超編：《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55、158。

⑦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145。

⑩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鄧正來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39。

⑪ 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72。

⑫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30.

⑬ 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頁76。

⑭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52。

⑮ 周明之著，雷頤譯：《胡適與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選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40。

⑯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3-74。

⑰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135。

⑱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1.

⑲ 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332、387。

⑳㉑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64；72-73。

㉒ 張太原：《〈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10、196。

㉓ David Cheng Chang,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79.

㉔ 章太炎早已指出，「《水經注》一書，這是北魏人所著，事實上已用不着，只文采豐富，可當古董罷了」。參見章太炎：《國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3。

㉕ 桑兵：〈《自由中國》與冷戰思維——以胡適為視角〉，《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頁182。

㉖ 曹聚仁：《魯迅評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154、162。

㉗ Jerome B. Gried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241, 179.

㉘ 周昌龍：《超越西潮：胡適與中國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45。

伍 國 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
歷史系副教授